

幻灭与希望

随着鸦片战争失败以来宪政民主和多党政治的屡试屡挫，效仿西方议会民主以救中国的痴梦在中国人心中逐渐破灭。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是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关怀和爱国主义情操相契合的；促使他们最终放弃西方民主主义幻想而师从苏俄劳动阶级民主的直接动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促成他们实现这种转变的社会运动，则是新文化民主启蒙运动和五四反帝爱国民主运动。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民主探索的特点，是用民主来诠释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民主政治最高级的实现形式。毛泽东提出中共要走出一条民主新路。

宪政民主在近代中国的坎坷命运

一、与坚船利炮结伴来到中国的西方民主

1940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

而中国在进入近代以前，是从来没有民主政治这个东西的，有的只是 2000 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尽管在历代中国封建王朝所提倡的主流意识形态即儒家政治文化中，有所谓“天听自我民听”、“民贵君轻”之说，但充其量只是对“天子”君主的伦理劝谕标准，只是为了让君更好地治民，而与民主政治风马牛不相及。在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人们也历来习惯于渴求圣明君廉臣贤相，希望他们能爱民如子勤政廉政，使国泰民安；如果不幸遭遇到昏君时代，他们也只把自己所承受的痛苦和灾难看成是不君不臣不父不子纲常伦理紊乱的结果，看成是个别坏皇帝和奸臣的罪孽，而绝不会怀疑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以及为其统治提供法理依据的儒家礼治文化，于是就期盼新的皇帝会重振纲纪、重整道德人心、重新励精图治、爱民如子勤政廉政如历史上的某某圣明君……

中国人认识民主接受民主学习民主实践民主，是在近代突然蒙受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瓜分的奇耻大辱之后，忍辱含垢师从西方先进国家以求图强自立的结果。换句话说，民主在近代中国的诞生，不仅不是由于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及资产阶级的壮大所引起的与封建地主阶级相互矛盾的结果，不仅

不是中国社会自身发展进步的必然要求，而且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恰恰是封建势力过于强大而资本主义无法发展的结果，恰恰是因为中国社会过于封闭落后、愚昧无知而被迫引入的结果。而推动近代中国民主发展的根本动力不仅不是来自自己社会内部发展的客观要求，反而是由西方列强侵略所带来的深刻的民族危机，是为了摆脱这种民族危机的救亡图存。因此，和西方民主一开始就抽象地鼓吹个人的权利与价值的闲情逸致不一样，近代中国的优秀分子模仿、学习、借鉴西方民主是以沉痛的悲剧色彩开始的，是以牺牲小我的价值而求得大我的生存和发展为起点和归宿的，是卧薪尝胆忍辱负重向正在掠夺和压迫我们民族的侵略者学习的，其中蕴涵了悲壮的民族忧患意识和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操。这就决定了近代中国所接受的民主只能更多的是为救亡图存服务的工具意义上的民主，而不可能是更多关注目的意义上的民主。而正当中国的优秀分子怀着复杂的心情跟在西方国家后面学习民主的时候，这些国家却在扬弃着其旧有民主而代之以新的较为真实和较为广泛的民主，从而造成了时空的错位，兼之迥异的制度基因和传统文化，以及进入中国的极为特殊的历史背景，西方民主政治从被请到古老的中国大地伊始，就决定了其艰难而坎坷的命运。

中国 2000 多年的封建主义政权统治制度和方式曾经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中国经济、文化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世界文明作出了贡献，并在历史上多次执世界文明之牛耳。直到 17 世纪、18 世纪之交的清王朝盛世之时，中华民族不仅在文化上雄风依旧，而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位居世界前列。所以，即便是当时最具有忧患意识和变革思想的优秀士大夫，也绝不会动摇对封建君主制度和儒家礼治秩序的坚定自信，也不会对“天朝上国”的国家地位有所怀疑，虽然他们在乾隆后期（而在此中

国社会日趋封闭和衰落之际，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却在近代工业文明中飞速崛起并开始了瓜分世界的殖民扩张）体察到了人民生活的苦难和社会矛盾的尖锐，虽然他们在人民起义的压力下感到了政治改革的必要，但即使其中最进步的改革主张也没有超出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它们不会也不可能包含任何否定封建专制主义的民主内容。这就注定了中国社会在西方列强的利炮炸开沉重的国门之前，是不可能土生土长出近代民主的思想果实的。

1840年6月，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以“保护英商贸易”为借口，对一直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中国正式发动了武装侵略的鸦片战争。结果，泱泱天朝帝国的数万大军，竟在自己的家门口被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数千名“蛮夷”之兵打得一败涂地。1840年8月29日，大清帝国的谈判代表在英军旗舰“康沃利斯”号上与英国签署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随后，国门被迫打开，在大清帝国统治者的图册上根本连找都找不到的“蛮夷之邦”的坚船利炮赳赳而来，与各弹丸之国被迫签署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条约接踵而至，“天朝上国”威仪尽失，脸面丢尽，中华民族几尽一夜之间遭遇了千古未有的变局，步入了半殖民化的苦难岁月。

巨大而惨重的失败，一方面深深地伤害了中华民族的自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另一方面也给近代以来自我封闭以世界中心自居的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参照，它迫使中华民族的最优秀分子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中华民族已经落伍了，在这个弱肉强食而儒家的“温良恭俭让”已经成为强者笑柄的丛林法则把持的世界，再不奋起救亡图存，知耻而后勇，中华民族就将亡国灭种；而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就是向西方学习、拜西人为师。于

是，他们开始放眼世界，开始向西方先进国家孜孜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二、从“中体西用”到“百日维新”

向西方学习什么呢？

首先他们看到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船坚炮利、武力强盛，于是就要求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养兵练兵之法。在这些中华民族的最优秀分子中间，魏源是当时的集中代表。而魏源最具有代表性并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主张，是他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原则。这是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枪炮威逼之下所作出的第一个比较切实的应世方略。它不仅包含了从西方学习先进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设想，而且极力倡导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人才和大力培养本国技术人才。尤为可贵的是，他把当时的中国置于近代世界的坐标上，并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中重新审视了数千年未变的传统，破天荒地对方西方资本主义的代议民主制度进行了高度赞扬和评介，为以后中国引入西方民主宪政思想作了心理上的铺垫和准备。当然，这种对西方民主政治的介绍和评判标准还是中国古代的圣贤之道，并没有学习西方民主制度以代替君主专制制度的意思，在当时也没有对社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倒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原则为当时优秀的仕人阶层所普遍认同，在列强入侵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内忧外患威逼下，这一原则也得到了清王朝统治者中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接受和支持，并在后来的洋务运动中得到了具体的运用。

《南京条约》签订之后，随着开辟五口通商和实行协定关税，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大量的工业品倾销到了中国市场，而中国大批的原材料被廉价掠夺，中国人民被吸血吮髓，国势日益衰

微。鉴于这种态势，在洋务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进而提出了不仅要在军事技术上向西方学习，而且更要在经济上师从西方国家，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以自握利权积蓄财力民力与外国竞争，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商战。而只有商战获胜，才会真正有可能在军事上占优势。他们在向西方学习军事工业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接触到了西方的法律和政治问题，因此为了与列强打交道时不吃亏，就有必要更详细地了解西方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

但是，他们这种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强烈爱国之举，却处处遭到封建制度的羁绊和地主阶级顽固保守势力的压制、排挤和打击。从中外对比和观察中，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日益产生了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厌恶和对西方资产阶级宪政民主的仰慕，认识到国家富强的根本在于政治制度，而器物技术只不过是辅助手段。他们迫切希望能改革专制政治制度，以便为发展军事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开辟道路。因此，他们提出了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而且要师从西方的政治制度，倡导“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政体，实行议会民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洋务运动以发展军事工业为初衷，却引发和导致了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实行政治民主的企求；而洋务运动的最终失败，则使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涓涓细流迅速演变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历史大潮。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洋务大臣们用西方国家先进的技术装备武装起来的福建海军，在法国舰队的攻击面前，仍然不堪一击，11艘兵船和整个马尾船厂，短短一个多小时就被敌人全部摧毁。除了刘永福的黑旗军和冯子材率领的清军为大清帝国和洋务派大臣挽回点面子外，其他各路清政府的正规军均一败涂

地。但腐败无能愚顽至极而又对内骄横凶残的清王朝，自鸦片战争以来早已习惯于以土地和白银换取和平苟且偷生的清政府，此时却在为“镇南关大捷”的局部胜利而弹冠相庆，连比较开明的洋务派大臣也为洋务运动仅有的这点儿果实而沾沾自喜，他们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去自觉主动地深刻反省军事失败的真正原因，更不会听取和采纳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政治改革主张。而此时的东邻岛国日本却在上下同心励精图治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明治维新”运动。其实这种政治上的鲜明对比已经决定了 9 年之后这两个历史上从来不可同日而语的国家之间的军事成败。

然而当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的消息真的传来时即便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先驱，即便他们已经有了很多不祥的推测和预感，也仍然感到无比的惊讶而难以置信，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仅存的那点寄托和幻想也彻底破灭了。如果说过去输给西方列强还勉强说得过去，那么，这场始于 1894 年、历时 8 个月的甲午战争，却败给了一个自己一直都瞧不起的“蕞尔岛国”并且败得惨不忍睹。大清帝国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所精心装备起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陆军部队更是连遭败绩，最终不得不与日本签订了自《南京条约》以来最为丧权辱国的条约——《马关条约》不仅割让包括台湾岛在内的大片国土，而且被强迫赔偿日本军费 2 亿两，加上所谓“赎辽费”3000 万两，共计 2.3 亿两白银，约合 4 亿日元，相当于日本当年国内财政收入的 5 倍。日本从此强大，并在 40 多年后再次对中国发起了一场比甲午战争更为野蛮和凶残的欺凌与侮辱，而且由甲午 8 个月的蹂躏延长到了 8 年。如果说鸦片战争的失败仅仅使先觉者感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的话，那么甲午战争的失败则意味着这种灭顶之灾已经变成了现实，并宣告了以洋务运动

求得“富国强兵”的“中兴”迷梦已经彻底破灭。它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在不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国家的物质技术和工商之道，是不可能实现救亡图存的目的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变革方案最终只能被用所谓“中学”组织起来的封建顽固保守势力打得粉碎。因此，政治制度的近代化，便成为了摆在当时所有先进的中华优秀分子面前的再也无法回避无法折衷的严峻问题。“要救国，只有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候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①。于是，在一批进步知识分子的奔走呼号和极力倡导下，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模式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君主立宪改良运动，揭开了近代中国宪政民主运动的序幕，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

三、孙中山说：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为了救亡图存而在经济、政治、法律、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改良主义宪政主张，其核心是要学习西方的宪政民主，设议院定宪法，建立以三权分立为原则的君主立宪制度。但是，表面上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由于缺乏宪政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土壤，兼之封建传统保守势力过于强大，而缺乏人民大众广泛认同和支持的维新派力量过于弱小，所以仅仅存活了百日便告失败了：光绪皇帝被囚于瀛台，维新志士或被处死，或被放逐，或流亡国外；曾经以光绪皇帝的一纸诏书下达的各项维新变法条例，很快被慈禧太后重新颁布的另外一纸诏书予以废除。对此，国外学者认为，“1900年以前，大批有才能的人并没有致力于真正的革命或

改革。在旧制度下，没有人具有根本改变这一制度的坚定信念。中国国内变革力量的弱小与其归咎于西方帝国主义倒不如归因于中国的社会秩序、国家和文化之强大。阻碍中国对西方的威胁作出迅速反应的抑制因素主要是中国文化的坚强内聚力和稳固的结构²。这种分析是很有道理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百日维新”虽然以失败告终，从实质的政治结果来看也没有能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这场惊动全国上下的政治改革运动，对于宣传维新变法和宪政民主的思想，对于启发民智，激扬民族士气，推动思想解放，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以至于后来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王朝统治者也不得不接受宪政主张，搞起了“新政”和“立宪”。这说明经过戊戌变法运动，维新思想和宪政观念已经成为人心所向的历史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同时，维新志士的热血也警示国人，企图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体制内实行自上而下的君主立宪是行不通的，企图依靠一个最大的敌对阶级中的个别开明人物去搞政治改革，去靠它革除自己的特权而让位给人民是不切实际的。

“百日维新”失败后，中国当时的优秀分子并没有动摇对中国实行宪政民主的坚定信念。但是就如何才能真正达到宪政的目标，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更好地更切合中国国情地实现宪政民主的理想，却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主张，并提出了两条完全不同的中国式宪政道路：一种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继续坚持的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道路；另一种是以孙中山、黄兴、章太炎、陈天华、邹容、秋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所推崇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道路。审视立宪派和革命派关于在中国实现宪政的方式的论争可以看出，双方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殚精竭虑想把一个专制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民主先进的中国，进而把一个贫弱不堪的中国变成一个富强的中国，从这个角

度看，双方都是民主派，都是中国民主事业的奋斗者。但立宪派在分析了国情以及革命对民主事业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后，认为在不改变国体的前提下通过政治改良来实现君主立宪，是中国民主化的最切合实际的也是最安全的通道；而资产阶级革命派则认为，只有用革命来清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才能为中国的民主化开辟道路。但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派在当时都显得过于理想化了。前者的理想化表现在对腐败无能的满清统治集团实行宪政的决心和能力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后者则把民主的实现想得过于简单了，以为通过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以为只要凭一纸约法来制约革命军领袖在革命胜利后争做皇帝的设想，就能够顺利解决建设民主政治的问题。他们都对中国民主化道路的曲折性和长期性没有足够的认识，都对“中国汪洋大海般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强大、顽固及其对民主事业的深层瓦解力和破坏力估计不够，对于如何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些破坏力进而为民主政治培植适宜的土壤更是不可能”有理性的把握（其实这种认识的深化伴随着中国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直到公元 1992 年我们才取得了对这个问题的自觉，才真正从一味通过政治变革来实现民主政治的迷谷中走了出来，才真正找到了中国民主事业建设的理性支点即经济制度的创新，当然这是后话）。这也就决定了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派都将在日后的政治风云变幻中为封建专制势力所毒害和愚弄。当然，这场争论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还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批判改良派君主立宪主张的同时，大力宣传了民主共和的思想，使革命越来越成为国人的共识，从而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奠定了思想舆论基础。而改良派的君主立宪主张，则伴随着末代帝国垂死挣扎的“立宪”挽歌消弭于波浪汹涌的革命洪流中了。

世纪之交的公元 1900 年（清光绪二十六年）中国发生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入侵，慈禧太后带光绪皇帝仓皇出逃，皇城北京沦陷。1901 年 9 月，清政府与西方诸列强签订了新世纪的第一个屈辱条约——《辛丑条约》。随之全球各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大清帝国已经到了连皇族安身立命之地都无法保障的境地，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王朝统治者这才终于认识到，一帮仕子草民 10 多年前闹的那场变法维新也不是没有一点儿道理。面对内外交困的危机，面对朝野上下痛切要求实行宪政改革的舆论压力，清王朝统治者最终不得不下决心进行政治革新，企图以此挽救大清帝国早已摇摇欲坠的垂死命运。然而，清朝政府在社会改革时机尚好时，为了守住自己的既得特权和利益而迟迟不愿甚至扼杀真正的政治革新，迟迟不愿变革自己的传统统治方式以适应历史发展潮流，而到感觉自己的统治地位岌岌可危之时才下决心改革的直接政治后果和代价，就是最终丢掉自己一直煞费苦心想保住的统治地位。就当时的实际境况而言，清朝统治者的确不得不吞下自己亲手酿造的苦酒：不实行宪政是死路一条，真的实行宪政也将是死路一条。

果然，清廷的这场过于迟缓的政治改革非但没有成为挽救其颓势的救命稻草，反而成了其迅速土崩瓦解的催命符。

1901 年 1 月 29 日，清廷发布上谕，宣布实行新政改革。新政改革尽管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君主的专制统治方式，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顺应了压抑已久的时代发展要求，并进而引发了全方位的社会变革浪潮：民族工商业开始得以复苏和发展，士绅两个社会阶层的数量剧增，人民的思想观念日益开放，革命力量也在迅速壮大。1904 年在中国的土地上爆发了日俄战争，两个外国为争夺在中国的权益而在中国的土地上开战，使朝野上

下更急切地感受到了被东西列强瓜分的危险；而小小的日本国竟然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沙俄帝国，更被中国人看作是立宪国战胜专制国的样板。为了对外避免遭受被瓜分的厄运，也为了以宪政来消弭革命，1906年9月，清廷发布预备立宪上谕。然而，清廷在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后，却又在立宪问题上宣布以9年作为预备期，并在立宪派的多次请愿和抗议后，才装模作样地组织了一个“皇族内阁”，依然迟迟不愿交出任何特权。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廷这才大惊失色如梦方醒，连发三道上谕表示“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释放自戊戌变法以来的所有政治犯，准开“党禁”，承认革命党为正式政党，命令资政院迅速起草宪法，在宪法颁布之前，先拟定重大信条十九条，宣誓太庙，于11月3日正式公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组织新内阁。此前不久还被清廷视为危害江山社稷心腹大患并被罢黜的袁世凯，如今被突然委以重任，无非是想利用被袁世凯实际控制的北洋军来镇压革命，包括《十九信条》其实都是清王朝统治者被逼出来的，就本质而言，清廷所关心的仅仅是如何稳定军心民心，如何消弭革命，如何维持其特权和利益，而决非真心实行宪政以顺应时代潮流，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袁世凯自然对清廷的本质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善于根据政治力量的发展趋势权衡利弊得失而行动的袁世凯，不仅没有成为企图用北洋军去扑灭革命的末日清廷的御用工具，反而借助革命的力量和压力把清王朝推向了死地，同时也宣告了立宪派企图依靠清朝政府实现宪政民主理想的最终失败。

1911年的辛亥革命，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人类历史上最漫长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结束。1911年12月30日，临时大总统选举预备会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2月31日，正式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改阴历为阳历，宣布1912年为为国民元年，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1 月 28 日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3 月 11 日，孙中山正式公布了近代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些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终于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诞生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此欢欣鼓舞，以为铲除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就为宪政民主建设扫除了障碍，开辟了道路，就可以放开手脚实现无数宪政民主奋斗者以前所没有条件实现的抱负和理想了，可以在最先进的共和民主政体下，通过民主建设的努力达到复兴中华民族的宏伟目标了。但是，后来残酷的现实宣告了这种幻想的破灭，建设民主政治的种种努力一次次受到重挫，仿效西方国家建立的民主共和制度不仅没有体现出人民期望的民主政治的任何优越，反而由多党制和代议制度带来了政治秩序的日益混乱，国家毫无起色，人民痛苦不堪，多年来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寄托和希望变成了巨大的失望，“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 增长了 发展了”。³ 连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先生也沉痛地说：“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⁴ 维新派过去所担心的那种一旦革命就会因革命本身所要求的集权性质而荼毒革命者民主初衷，甚至会造成革命军领袖在革命胜利后争做皇帝的预言，被不幸言中了；而革命党人以为依靠一纸《临时约法》就能避免民主被参加革命的军事领袖们所荼毒的幻想，很快便被袁世凯上台后的独裁统治所破灭。孙中山在后来总结这段教训时说：“辛亥之役 汲汲于制定《临时约法》 以为可以奠民国之基础 而不知乃适得其反。……试观元年《临时约法》颁布以后 反革命之势力不惟不因以消灭 反得凭借之以肆其恶 终且取《临时约法》而

毁之。”⁵

1912年2月13日袁世凯在成功威逼清帝退位后公开声明赞成共和。2月14日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职并举荐袁世凯继任。2月15日，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1913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3月20日，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彻底宣告了革命党人政党内阁和责任内阁主张的失败。10月10日袁世凯操纵国会选举他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11月4日袁世凯正式下令解散国民党。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下令撤销参众两院议员职务并遣回原籍，国会被迫解散。1915年10月，袁世凯操纵所谓‘国民代表大会’投票废除多党议会政治实行君主立宪，民国初年风光一时的政党政治热潮，至此彻底终结。

袁世凯在全国上下的声讨声中死了，但接踵而来的不是人们期望的宪政国家却是长达10年的军阀混战。这又不幸应验了极力撺掇袁世凯放弃共和民主而取君主立宪者们的预言：如果不确立一种君主立宪的集权体制而取共和政体，必然会因总统更迭所造成的权力真空而引发北洋军阀争夺最高权力的内战。果然，各地军阀借反袁护法维宪之名乘机争夺地盘，扩张各自的势力范围。鉴于袁世凯的教训，这些军阀打的依然是民国的旗号，采用的也是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但实质上行的却是军阀集团的极权独裁统治。而本来应当是神圣的宪法，却成了为各军阀争夺统治权提供服务的掌中玩物，期间所进行的立宪和修宪闹剧让人目不暇接，其修宪立宪的频率堪称世界之最。至此，革命志士付出巨大牺牲所换来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剩下的仅仅是一具空洞的躯壳了。

孙中山先生在痛心疾首中，开始了对中国式民主道路的冷静反思。他从多年的民主革命奋斗和牺牲中逐渐认识到，在中国

这样一个封建君主专制传统根深蒂固，而人民的近代民主意识极其淡漠的国家，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决非一朝一夕之功，人民民主意识的培养和国家民主事业的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面对一次次民主宪政实践的惨痛教训，孙中山在 1914 年新成立的中华革命党总章中，重申了以前曾提出过的三段革命程序论，即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并将其修改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其中军政时期是以积极武力扫除一切宪政民主障碍而奠定民国基础，训政时期是以文明法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宪政时期是待地方自治完成之后，由国民选举代表组织宪法委员会创制宪法。孙中山在生前反复强调了训政时期的必要性，他认为由军政时期直接进入宪政时期将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第一流弊在旧污未由涤荡，新治未由进行 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 以为新治 第三流弊由发扬旧污 压抑新治。更端言之，即第一民治不能实现，第二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并民治之名而去之也。”¹⁶ 他以为，只有实行了他所讲的训政时期，就能够避免以上民主悲剧的再次发生。然而，孙中山怎么也不可能预想到，他煞费苦心力图保卫民主果实的训政，在他死后恰恰成了他所极力避免的上述流弊的导火索。

至此，戊戌变法的君主立宪改良以六君子喋血而终；辛亥革命的共和政体实验被袁世凯和北京军阀政府蹂躏荼毒殆尽；从西方学来的多党竞争制度，在各派军阀、官僚、政客的争权夺利游戏中，最终沦落到为任何当时想洁身自好者所羞于言党、言党色变的境地；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训政实践不仅没有成为国民党实现宪政民主的必要准备，反而变成了蒋介石法西斯独裁专制的“合法”借口和理论依据，并最终蜕变为蒋介石个人极权的党国政治、特务政治……正如毛泽东所总结的那样，“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 都失败了”¹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 资产阶级的

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⁷ 林伯渠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也感慨地说“，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清帝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⁸ 那么，为中国人民带来真正福祉的民主之路何在？具有 2000 多年封建君主专制传统的古老中华帝国是不是根本就不可能实行民主政治？一次次民主实践的惨痛失败，使一些人对中国实行民主产生了怀疑和绝望。

就在中国政治民主化道路处于十字路口的严峻关头，中华民族的一批最优秀分子开始了对中国宪政民主道路的全新思考和探索。

他们就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先驱。

而启发和促成他们这种全新探索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动因，是 1917 年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先驱的民主探索

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幻想的破灭

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思考和接受宪政民主思想，都是以拯救民族和复兴民族这两大主题为基线的。换句话说，只有那种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关怀和爱国主义情操相契合的民主理念，才是最适合近代中国社会需要，并能够在中国社会生根开花结果的民主理念。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也同此理。而促使他们最终放弃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幻想并师从苏俄劳动阶级民主的直接动

因，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促成他们实现这种转变的社会运动，则是新文化民主启蒙运动和五四反帝爱国民主运动。

民国初年经过无数牺牲奋斗所建立的民主共和制度，在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下转瞬之间化为了泡影。就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派政治家们为护国护法而苦苦斗争的时候，一些一直致力于民主和进步的知识分子（有不少人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先驱）却从思想文化的深层底蕴开始了对这次失败的反思。他们认为袁世凯破坏共和的行为之所以被许多人所认同，甚至被一些思想很新派很开明的人所认同，误以为这种“开明专制”是中国走向立宪政治的必由之路，关键是中国社会缺乏民主政治生存的文化土壤，而根深蒂固强大无比的却是与专制政治紧密契合的“崇古尊圣”的习惯势力以及依赖“贤人政治”的社会心理；而选择中国民主道路的前提条件，并不是被动地认于这种无奈的国情而与专制政治妥协走“开明专制”之路，而是首先要通过大力批判和清除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传统，把多数国民头脑中的旧思想旧观念冲洗干净，以此唤醒人民的民主自觉，为民主政治和共和制度奠立社会基础。他们企图把中国引向民主、独立、富强的新社会的方法，是彻底批判和摧毁一切封建主义的旧事物；而用来批判和摧毁旧事物的武器，依然是从西方借来的“德先生”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合理回答如何通过这种方法来达到建立新社会的目标，也没有办法令人信服地回答如何用这种武器来解决当时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所遇到的一系列难题。所以，新文化运动尽管对近代中国的民主启蒙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它依然不可能解决中国民主建设的道路和方向问题。尤其是其倡导者们所提出要实现的“新国家新社会”仍是资本主义的共和立宪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而这在当